

論“一國兩制”理論科學定位的必要性、迫切性

楊允中*

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胡錦濤《中共十八大報告》

一、前言

中國作為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有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東方大國，過去、現在都存在大量極富開發探索價值的理論陣地，都不缺乏有突出理論建樹的大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一個當代最富創新價值、最具挑戰性的重大理論課題，它內涵豐富，包容量大，是幾代創造性認知的總結與昇華。由於這個全新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已足以讓中國全面進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已足以使海內外華人理所當然地開始成為受到尊重的平等一族。理論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規律性認識的集中體現，屬於社會精神財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理論是認知的系統化、規範化、定型化。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既不應盲目自大，也不應妄自菲薄；既不應貶低自己的信仰和傳統，也不應拒絕接受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必須以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科學總結和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成就和寶貴經驗，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¹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經鄧小平倡導與推動，經香港、澳門兩部基本法加以法制化具體化，經港澳兩特別行政區長逾十多年的實踐與驗證，已由“偉大構想”進入全面實踐，已由實踐的“摸石頭過河”到認知的逐步系統化、成熟化。

澳門被歷史選中成為驗證“一國兩制”新理

論、新思維的示範區，無論特區政府還是特區居民都是歷史的幸運者——成為正確實踐“一國兩制”有效載體。澳門的地位、功能十分突出，澳門的價值、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講，澳門是研究“一國兩制”理論的前沿陣地，澳門居民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行為主體，而澳門學者更應成為“一國兩制”理論的有效載體。在澳門所發生的一切，無論從政治、法律，還是經濟、民生，以至社會、文化方面觀察，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下依法施政的結果，都直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構成正相關，都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實際推進過程。要讓澳門特區展示出更高的驗證、示範成功率，就要進一步提升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知的自覺性，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上及時作出回應、作出選擇。

二、關於認識論的幾個核心理念

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衷共濟的和諧世界觀，求同存異、兼容並蓄、融會貫通的互補共贏新思維，陰陽互濟、剛柔並重、內外兼及的兩手策略，這是中華智慧、東方文明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全面展示，這是華夏子孫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科學世界觀和辯證認識論的昇華。

(一) 知行合一

所謂知行合一，亦即知行相統一的觀點。“知”即知識、認識的意思；“行”即行動和踐履。中國學者向來主張，知行統一觀就是關於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理論、學說，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傳統哲學的知行觀具有鮮明的倫理特點，哲學家討論知行問題，多從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係立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論，主要是指個人的道德踐履和道德修養，但其中也包含着認識論上的意義。爲了鼓動人們起來推翻滿清，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說，賦予“行”的概念以革命實踐的內容。毛澤東更加強調“行”即實踐的作用與意義，他的代表性理論著作《實踐論》規定了知行範疇的科學內涵，爲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提供了科學指引。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強調知行統一觀。不知不行、不行不知，有時先知後行，有時先行後知，程序上都是必要的。要在20世紀末之前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這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知”，要用一種嶄新思維、雙贏模式有效地解決香港、澳門的回歸，這是新時代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要求採用的“行”。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根據對國家多年來正反經驗的總結，及時推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恰到好處地解決了知與行的關係，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爭論”、“三個有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科學判斷充滿哲理、充滿智慧，僅僅三十多年的奮發圖強、艱苦奮鬥便徹底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並使之逐步走上大國俱樂部、強國俱樂部的舞台。無疑，這是知行合一科學認識論的成功。

(二) 求同存異

這是一個大思維，一個既通俗又深奧的大道理，一個講來容易做來難的老問題。其邏輯重點是指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點，力求以同化異、以異促同，做到互相尊重、和平相處、優勢互補。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便倡導“和爲貴”、“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明、東方智慧的體現。在人類社會中，由於利益、願望、興趣、愛好之不同，存在某些不同的觀點、想法不足爲奇，但本着互相依存、互補優勢的理念，應在大原則、大方向、大目標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適度保留、尊重某些不同要求，既求大同又存小異。事實上，“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淵源與求同存異思維密不可分。不同國家之間歷史遺留的問題可以用非和平手段解決，也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可以用激進的強硬手段解決，也可以用理性化的智取模式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總理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首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世界上享有良好的口碑。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所體現的求同存異原則和精神是當代最佳思維判斷。惟求同方能提升共識，擴大合作面，整合競爭力；惟存異方能突顯多彩世界，也不埋沒任何獨到見解。求同存異有助於互補共贏，防止內

爭內訌，促進和諧共融、取長補短，大至國家施政，小至個人關係都是一個務實選擇。

進入特別行政區全新發展階段，特區政府官員也好，社會各界包括學者也好，都應學會用文明、理性同別人對話，學會用永無止境的追求與探索來拓展自身實踐“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

(三) 和諧包容

中國千百年來世代相襲的文化傳統中，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大愛無疆”、“和諧共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戰而勝，以智取勝”等文明理念。這中間，“知行合一”與“求同存異”又是兩大核心價值，兩個孕育極大力量源泉的成熟認知，同時也是“一國兩制”理論得以最終正確形成的思想淵源。

“中華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對話中，應該而且必然有所作爲，有所貢獻。這是因爲，中華民族向以極大地包容、注重和諧、酷愛和平著稱；我們有着保證了中華民族獨樹一幟地保持幾千年一統和穩定的文明因素和豐富經驗。”²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已成功地走向世界，全球各個板塊也爭相向中國靠攏。早在三十多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即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發展主旋律的判斷，20世紀末中共十五大又作出直至21世紀前20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這中間貫穿一條中華文明對和爲貴、人類自身和諧以及與自然界之間保持和諧的崇高理念和科學認知。

我們的願望和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包括和諧包容在內的新型社會關係，也包括新型的國際關係。因爲和諧體現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進經濟全球化，朝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³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一) 歷史進程

1979年3月2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

出發。”⁴ 1982年9月1日，他在向中共十二大致開幕詞時，明確而嚴謹地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⁵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綫寫入黨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簡化成鄧小平理論並確立為中共指導思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概念。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涵，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念及其內涵。⁶ 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共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偉大旗幟、道路、制度共同並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大核心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⁷ 這個理論體系，涉及對三大基本問題的回答和對三大基本規律的總結，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綫，不斷探索和回答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甚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甚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並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綫、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不斷深化和發展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認識。”⁸

（二）鄧小平理論歷史地位不容動搖

中共十五大總結的鄧小平理論中用“祖國統一”來表徵“一國兩制”，兩者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互通性，而“一國兩制”所展示的求同存異等哲學機理又將可能在處理國家內部問題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其不可取代的指導、協調作用，甚至可能為學科再造提供令人信服的借鑒。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

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⁹ 它是貫通哲學、法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綫等方面比較完備並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這組內容豐富、涵蓋面廣、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要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實施，後者主要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處於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軍事制度。”¹⁰

作為鄧小平理論九大組成部分之一的“一國兩制”理論，涉及祖國和平統一的路徑選擇和實現要求，它直接關係到對國家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綫、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堅持和豐富，直接關係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軍事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故此，“一國兩制”理論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最具中國特色、最具創新價值、最吸引國人和世人眼球的全新型標桿性理論。

四、“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涵與創新價值

（一）“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繫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¹¹ 這個判斷對觀察、分析“一國兩制”理論十分重要。“一國兩制”現已成為東方地平綫上一門顯學，它講求大寬鬆度、大包容量，倡導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本身就是思維、認知上的創新。

1. 國家主權論，即堅持一個中國理念

“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¹² 中國是統一而完整的東方大國，中國版圖既包括作為國家主體部分的大陸，也包括海峽對岸的台灣地區，當然也包括因歷史原因一度淪為外國管治的港澳地區；既包括逾960萬平方

公里的陸上面積，也包括逾3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海域；既包括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且在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迅猛提升的國家主體部分，也包括實行資本主義且在經濟、民生領域取得較好成果的局部地區。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逐步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和利益所在，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並令其同國家主體部分保持同步繁榮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 兩制共存論

國家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31條）基本法規定：“澳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5條）這是基於歷史和現實，基於國情和區情，基於全國人民意願和港澳兩地居民意願。事實有力地證明在國家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局部地區靈活實行該地區原有社會制度是有益有利的，這意味着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特區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優勢，也可有效利用國家支持的“一國兩制”優勢，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可以在特區得到合理整合。

3. “澳人治澳”論

和“港人治港”一樣，“澳人治澳”表明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尊重本地人首創精神和人格尊嚴的創新制度安排。十多年實踐“一國兩制”的歷史令人信服地證明，澳門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發展好建設好澳門。

4. 高度自治論

基本法規定，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2條）除直接體現國家主權的外交、國防外，特區公權力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迄今為止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平。重要一點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¹³

5. 政策穩定論

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5條）從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宣佈“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到兩部基本法確認的五十年不變的終結期共約七十年，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的三代人成長與開拓期。經法制化的這項政策指引亦屬中外歷史所罕見。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是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在於在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

6. 長期示範論

作為基本國策，“一國兩制”在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十多年實踐已展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它已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內涵。充滿生機活力的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了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澳門經濟民生指標的巨變更驗證了“一國兩制”科學性、合理性與可行性。因而，可以毫不誇大地講，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與發展，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發展進步，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香港和澳門，作為國家的兩顆掌上明珠必將進一步散發出奪目光彩。

（二）“一國兩制”理論：在創新中發展，在實踐中完善

隨着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相繼建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正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確保兩地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已及時進入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議事日程，也是特區居民本身的歷史使命。“一國兩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和民族偉大復興。“‘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¹⁴因而，對“一國兩制”理論，對基本法的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就成為國家和特區學術理論界一項十分突出而迫切的重大課題。

早在2004年12月，胡錦濤便指出：“‘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政府治

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因此，“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都需要在貫徹‘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前進。”¹⁵ 要對“一國兩制”、基本法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已成為國家領導人反覆強調的一個重大課題。2007年6月吳邦國針對香港特區指出：“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深入實施基本法的同時，需要本着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進一步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幾次釋法的經驗，及時解決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¹⁶ 2009年12月吳邦國針對澳門特區指出：“隨着澳門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實施中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況。我們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同時，要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認真總結基本法實施中的好經驗好做法，研究解決基本法實施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理論和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¹⁷

吳邦國還進一步指出：“撫今追昔，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親自領導制定對香港、澳門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開闢了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切實可行道路，指引着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前進方向；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妥善應對各種複雜矛盾和挑戰，進行開創性的實踐，確保了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使‘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作為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¹⁸ “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¹⁹ 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喬曉陽副秘書長指出，“‘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眾多貢獻中的又一項偉大貢獻，為世界解決這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維和典型範例。”²⁰ “‘一國兩制’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典範，是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典範，充分體現了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精神，充分體現了和平和諧、合作共贏的思想。因此，‘一國兩制’不僅是一個極其豐富的政治學、法學理論寶庫，也是一個

極其豐富的經濟學、哲學、文化等理論寶庫，值得我們認真挖掘。”²¹

五、關於“一國兩制”理論學科歸屬

（一）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認知

1. “一國兩制”，這是業已成熟至少是基本成熟的新型理論體系。衡量理論成熟化至少有兩大標準不容忽略：一是對社會現實的指導作用，實踐上是否行得通，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穩步推進；二是公權力機關的認知與廣大民眾的理解是否達到理性化程度。“一國兩制”，它不僅涵蓋面廣，創新價值高，影響力深遠，而且自成體系，吸引越來越多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學者樂此不疲地投入奉獻，開拓完善。它產生於中國特殊社會環境，植根於體現東方文明的古老華夏認識體系與傳統文化，經國家領導人積極倡導、定位已獲國人與世人廣泛認同，而且經兩個特別行政區逾十年實踐驗證正確而可行，具有巨大生命力與優越性。

2. 它標誌着新型政治發展模式的初步成功。新發展模式既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又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既令原有社會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不變，又為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政治體制、新運行機制、新施政理念得以全面啓動作出引導，現今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已全面投入運行且已展示出無比生命力、競爭力。

3. 這是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理念尤其明顯，這是千百年人善良人的熱切追求，如今得以形成制度化、規範化的發展環境和約束機制。在這一機制下，自由表達、公平競爭、主動參與逐漸成為常態。人們在現實中也進一步理解到求大同存小異、寬鬆包容、人人均有直接參與機會的大環境的重要性。特別行政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傳統中國人、東方人的思維定勢，而且也以活生生的事實令全球有識之士為之震驚。

4.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記錄。正因為它是多重創新，半個世紀之前不僅沒人做過，甚至也無人敢於想過；不僅特區官員、居民沒有做過，國家領導人也未曾做過。故此，在實踐過程中即使出現一些人們不想見到的甚至是負面現象，絕對不需大驚小怪：該依法處理的就依法處理，該存在改善空間的就認真加以改善，不過如此。“‘一國兩制’不僅是對人類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不僅是憲法學、行政法學，而且是法理學

等各個法學領域)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也是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哲學思想和人的思維方式等都提出了重大挑戰。”²² 越來越清晰的一點是,“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²³

(二) “一國兩制”與憲法學、憲政研究課題

“一國兩制”產生在當代中國,也發展在當代中國。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十多年實踐“一國兩制”已積累了初步經驗,已走上各自適用的發展路向。現在擺在港澳人士面前的突出課題,已不再是對“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理解與討論,而是對自己驗證“一國兩制”經驗、問題、教訓及時作出清醒明智反思和總結。特區的人和事都可以用“一國兩制”加以定性和分類,順暢的成功方方面面當然是“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驗證成果,不順不暢的,不被認定是正面成功的問題、矛盾,也宜用“一國兩制”加以驗證:或是對基本國策缺乏認知所致,或是制定已約二十年的基本法某些規定存有再認識的必要,或是善良人們不想見到的某些不測外來因素所使然。

從學科範圍、研究對象觀察,“一國兩制”首先是憲法學理論的最新內涵,也是憲政發展的一個突出關注點。目前憲法已有三個條文進行指引,即第31條、第62條、第59條。實際上,“一國兩制”也是現代政治學需要重點研究的一大課題。它涉及國體、政體等政治學核心概念。當然,“一國兩制”也可理解為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理論課題,甚至也可界定為一個新型具大覆蓋面的交叉學科,除憲法學、法理學、國際法等法學範疇以及國體、政體、行政主導等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範疇外,它還要求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文獻學、人類學,以至傳媒學、美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予以認真關注。

從現有法律定位和發展潛質觀察,“一國兩制”業已有條件成為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上,集中體現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的創新型學科,故此,進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加大相關專業人才梯隊的培養力度,已構成對中國高等教育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嚴峻挑戰。對於這項活動的關注與重視,投入與參與,

與,力度越大越好,時序越早越好。

(三) 一個呼之欲出的複合型學科

無論從研究對象與範圍的廣濶性、明確性觀察,還是從形勢演進的挑戰性、風險性判斷,盡早就“一國兩制”理論的學科定位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做出治如其份、符合實際的定性認知,完全必要必須,有益有建設性。提升相關使命感、責任感,對於特區學者和全國學者來講,也都是一項迫在眉睫的現實課題。

“一國兩制”政治上倡導互信互諒,經濟上主張互利互補,文化上推動互通互容;總結“一國兩制”實踐與發展規律,提升“一國兩制”理論的權威性時代性價值,不僅有基本國策的保障與引導,而且有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作驗證實踐現實的示範平台;不僅事關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民族偉大復興的莊嚴奮鬥目標,而且直接事關特區居民基本權益的實現和基本福祉的保障以及全體中國人民的殷切期盼。這是一個大理論、大學科,把它定位成“一國兩制”學(包括“一國兩制”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社會學、“一國兩制”經濟學、“一國兩制”哲學等等)完全可行,給它取個較為通俗的“共贏學”(互贏學、多贏學, poliwinology, win-winology)名稱亦未嘗不可。形勢發展將有可能證明,這個創新型學科對現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結構與內涵設定帶來的是一場革命性優化與促進,並會受到越來越多學科與學者的普遍認同與支持。

六、有待多學科關注並全方位支持的新興理論

作為新興理論,“一國兩制”理念、理論的形成與完善源於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全方位支持,其正確實踐與驗證同樣有待各傳統學科在理論導向上的密切配合。以下試舉例說明。

(一) 外交學、國際關係學

“弱國無外交”,代表國家處理對外事務,事關國家主權、核心利益,故“外交無小事”,人人要懂外交,外交思想、理念、原則,充滿鬥爭、充滿智慧。傑出領導人、外交家可以改寫歷史,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首屆亞非會議上周恩來的大義凜然、大度大氣,成為現代外交史上的傳世之作。中英、中葡兩次

具改寫歷史性質的外交談判，完完全全依據中方十二點基本方針政策進行，展示了中國的實力，同時也展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堅定決心和高超智慧。基本法規定，外交權屬中央，但特區有對外交往權，在中央授權下，保持暢通國際聯繫網絡，對特區對國家都有益而無害。當然，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亦要警鐘長鳴。

(二) 軍事學、軍事科學或國防學

軍事科學是“反映戰爭和國防的本質的規律並用於指導戰爭和國防的準備與實施的科學”²⁴，軍事學術是“關於作戰指導和軍隊建設理論與方法的統稱”²⁵。槍桿子是維護主權獨立的有效主體，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力量要黨指揮槍，這個原則今後還要堅持。常規戰也好、現代特種戰也好，都要講兩手：一是展示發達肌肉，而且要“船堅炮利”；二是展示謀略，以智取勝，訓練有素。《孫子兵法》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兵書之一，主張鬥勇鬥智相結合。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全勝戰略思想，對後世以及國際上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和平收回主權開真正不戰而勝的國際先河。順利回歸離不開強大國防，回歸後的繁榮穩定同樣離不開國防，離不開鬥爭藝術的完善。

(三) 經濟學、管理學

經濟學是一個綜合性學科，它所強調的資源配置合理性、市場競爭充分性、高投入產出比，對於“一國兩制”都有現實指導意義。無論強調自主命運的微型經濟學還是主張互利共贏的區域經濟學，無論追求跨越的發展經濟學還是側重場內博弈以及社會博弈的博彩經濟學，都有眾多課題要回應要探索，都要在特區深入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予以理論突破。

(四) 歷史學

以史為鑒：人類文明進程、發展經驗對澳門十分重要，而澳門開埠近五世紀對中國近現代史、東方文明史、人類文明史均具有特殊的參照、判斷價值。澳門歷史曲折而豐富，份屬史學富礦、人文社會科學富礦，2005年 UNESCO 確定澳門歷史城區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應該說這僅僅是一個良好開端，繼續發掘、開發歷史文化遺產，總結小城幾百年來歷史演進的經驗與啓示，應成為澳門學術界一項長遠奮鬥目標。

(五) 社會學

社會關係協調、社會結構優化、社會利益共享、社會文明積累、社會生態健康，是當代社會學倡導並致力推動的目標。求同存異、寬鬆包容、公民意識與多元選擇，都應成為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和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與要求。

(六) 政治學

即研究國家公權有效行使的科學或管理國家大事的科學。恢復行使主權是國家大事，確保長期繁榮穩定也是國家大事，故此，政府官員也好，普通市民也好，適當掌握政治學知識並應用於依法施政實踐，完全必要。這其中多懂一點中國國情，多關注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應成為一個常態化課題；通過“一國兩制”實踐認真思考研究社會主義如何利用資本主義、管好資本主義，同樣具有特殊的積極性建設性。

(七) 法學

亦可稱之為社會規範學。確保公權正當性和民權充分性，即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要求，也是現代法學尤其是憲法學的核心主題。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法制化最大成果，開創多項第一：長達4年5個月起草過程史上罕見，一個彈丸之地擁有一部具憲法結構的特區根本大法也極少見，正式頒佈與正式生效之間達6年8個月超長提前量，幾十萬人口的小城擁有終審權創國際之最，諸多破格優惠，不勝枚舉。

(八) 哲學

哲學是“對宇宙作整體研究或綜合研究的學科”²⁶，“關於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及其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學問”²⁷。處理好知與行、同與異、存在與意識相互關係，總結好社會發展的根本性認知，是哲學界的研究目標。“一國兩制”理論的形成與完善，令中國哲學佔據了一個創新的制高點，佔據了一個主動有利的陣位。其中，認識論的完善是“一國兩制”理論創新重要內涵。哲學也是學問，哲學也有樸素務實即可認知性一面，我們不應敬而遠之，自我邊緣化。

(九) 心理學

心理學是研究包括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徵的基本規律的科學。²⁸ 預防

心理障礙，進一步消除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當前、今後都具現實意義，保持居民健康的心理狀態，是現代社會、發達社會的一個常態化推動目標，澳門亦不應例外。

(十) 美學

美學是研究審美關係和審美意識，美的創造、發展、美育及其規律的科學²⁹。美育是社會文明的一項重要表徵，要抓住不放。中華文明歷來倡導“真善美”，“一國兩制”認識論的核心是求同存異，做到最大限度的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就是真善美。真誠希望“真善美”這三個字能逐步成為澳門居民生涯規劃與自我完善的一個文明標桿，成年人要補課，青少年美育教育更應加強，政府、社團、學者、居民都應身體力行、全力以赴。

七、某些非理性判斷簡評

面對兩個特別行政區日新月異快速發展形勢，“一國兩制”的必然性、科學性也好，可行性、優越性也好受到越來越廣泛認同，這個新事物的生命力和創新價值已引起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關注。同樣，面對特區民主訴求多元化複雜化新形勢，加大系統研究力度，確保主流價值導向，確保基本國策既定大方向不被干擾，也是一篇必要而緊迫的大文章，做好它並不容易。“一國兩制”正因為它新，所以在實踐中出現一些難以預見或不想見到的情況在所難免，關鍵在於積極面對，認真總結“摸石頭過河”經驗；“一國兩制”正因為它特別，所以對待特區一些是是非非、風風雨雨既要堅守原則底綫又要實事求是，該堅守底綫的就堅守底綫，該靈活處置的就靈活處置。不管誤解誤判還是心存疑慮，不管直接挑戰還是心有不甘，都要分清是非、堅持原則，認真對待，而不宜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一) 無可奈何說

有人認為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如果內地發展有今天這樣水平，肯定不必要搞“一國兩制”，還不是手到擒來一下子就解決問題。在當時兩地發展水平存有巨大落差情況下只好遷就讓步，甚至連終審權都下放了。歷史不存在假設，事到如今，每個正直的中國人都應該為國家日新異快速發展感到高興，同時則應對初見成效的“一國兩制”事業充滿信心。

(二) 沉重包袱說

有人感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至今亂象叢生，認為它是國家的一大“政治包袱”，而澳門特別行政區依賴博彩業每年截流內地的錢數以千億計，故它是國家的一大“經濟包袱”。這種觀點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看消極一面不看積極一面，顯然屬以偏概全、以末否本。

(三) 權宜之計說或將計就計說

有人公開講“50年不變”承諾已過去1/4-1/3，只要餘下時間不出大亂子到時就好辦；根本沒必要作甚麼系統研究。這顯然對基本國策的長期性缺乏認知，“一國兩制”存續即使只有50年，那也不容輕易放手不管，其發展規律、特定價值早已進入歷史。

(四) 獨毒成型說

這主要是部分內地人士表達的聲音，“既然已亂到這個地步，那就叫它亂個夠，到時一起收拾。”甚至有人把港獨說成是比藏獨、疆獨更危險。警惕某些異端行為完全必要，在港澳這樣多元化社會，存在個別有反骨的人不足為奇，但不宜把一時認識模糊的人同“獨”字劃上等號，暫時事態尚未發展到失控失序地步。重要的是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保持清醒頭腦。

(五) 政策有誤說

有人說當初對形勢判斷可能有問題，本以為回歸大關一過，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成立，就可風平浪靜，天下太平。沒估到當下形勢比回歸前還複雜。這種有失理性的過慮和擔憂亦非屬罕見，不能不引起重視。

(六) 形勢失控說

回歸前有人擔心港英會變成“跛腳鴨”，沒估到今天香港特區政府似乎患上軟骨病，當斷不斷，自己反而成了“跛腳鴨”。不管如何，認真總結兩個特區實踐“一國兩制”的正反經驗完全必要。

(七) 順其自然說

排除複雜的國際因素先不討論，在特區居然有如此眾多民眾心存抗拒，並參與形形色色的抗爭，法不責眾，特區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看來也只好順其自然，靜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顯然，這種消極認知並非少數人存在，值得重視。

(八) 啓用下一代智商說

如同國家面對的東海、南海爭端恐一時半時難以得到妥善處理，只好留給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看起來，特區真正做到有效管治恐也要靠下下一代的高智商來回應。上述消極不作爲心態不應認爲是合理的。

(九) 偽科學偽命題說

有人認定“一國兩制”不需浪費資源去研究，因爲是偽科學，國家實行“一國兩制”也是偽命題，全國全面否定新興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價值，儘管這類判斷極爲罕見，但其腐蝕作用絕不容低估。

(十) 自喻先進說

有人說甚麼香港是現代化民主化樣板，要設法使大陸居民向香港學習，走香港民主化之路。毫無疑問，香港在現代化建設上積累了一定的西方經驗，但是把近年香港民主化、多元化進程中的種種亂象用“先進”、“文明”加以表徵恐怕絕不符合實際。澳門也有那麼幾個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古今中外樣樣懂事事通，甚麼都反甚麼都批，對於“一國兩制”這樣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大事也不肯放手，到頭來只能證明其獨來獨往行爲並非真正聰明。

八、構建大“一國兩制”思維， 培育“一國兩制”文明

(一) 形勢比人強

鄧小平早在 1982 年便指出：“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爲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爲最大恥辱。”³⁰ 他還充滿激情地說：“我們有充分的根據相信，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正確的綱領，一定能夠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使我們黨興旺發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使我們的國家和各民族興旺發展。”³¹

30 年後業已全面走向興旺發達的中國和中國人都是這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巨變的見證，13 年來在鄧小平親手指定並全力推進的“一國兩制”方針指引，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樣發生着開埠 460 年來不曾有過的巨變。“一國兩制”社會現實的強勢存在，有力驗證了這項基本國策的必然性、科學性、可行性、優越性。但不容迴避的客觀現實是，圍繞特別行政區、圍繞“一國兩制”恐怕至今依然存在着認知上的差

異。本人早在澳門回歸時便提出要認真防範“回歸思維滯後綜合症”，但 13 年後的今天，澳門特區恐怕不能排除這種病症的患者，至於在有人公開對抗國民教育的鄰近地區也許患者面就更大一些。在香港、澳門這樣國際化程度高的地方，居民的信仰和價值觀亦必然多元化，某種意義上講是好現象，是優勢，但任何情勢下，主流價值觀的導向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作爲有效行使管治權的政府也好，社會各界力爭順勢而行的團體、個人也好都應高度關注、理性對待、積極反應。看不到或不承認時代發展的主流大方向，逆向而行、背道而馳者，絕不應一再得計、一再得逞。當然，主導者要善於及時總結教訓，正確運用公權力，正確啓動民間智慧。

(二) 破解博彩悖論

在澳門，圍繞博彩業存在價值以及它與產業相對多元化的關聯的爭論，也許還會長期存在。這裏，一是博彩博弈的關係。一提博彩，人們往往要抓住賭場、娛樂場不放，對其過分崇拜、依賴不妥，全面排斥、否定也不妥，其實，人類社會本身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無時不在的博弈場，在社會大舞台上健康力量與非健康力量在博弈，文明行爲與非文明行爲在博弈。政治領域是圍繞一個“權”字在博弈，經濟領域是圍繞一個“錢”字在博弈，文化領域是圍繞是與非、對與錯，即圍繞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判斷價值在博弈。故此，如果有朝一日出現一個叫社會博弈學的新學科，那絕不會令人意外。二是博彩業利弊關係。有人說澳門博彩靠賺大陸人錢而生存，有人說它是非文明產業，過分依賴它會後患無窮。博彩業的副作用和弊端絕對不容否定，但今天的澳門博彩業，首先是法定產業，依法經營、依法監管，即有其存在合法性；其次權衡利弊絕不是兩相等同或互爲抵銷，而是利遠大於弊、功遠大於過，即具相對合理性；再次人們不應忘記，它在澳門存在已超過一個半世紀還多，它不是因特區成立而開辦，2002 年的開放只是經營主體相對多元化。

(三) 姓資姓社

對“一國兩制”造成的理論誤區，首要的恐怕還是集中在社會主義本質與資本主義本質的認知上。除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外，對當代中國認知不足恐怕主要是由於思想片面性所致，日益強大進步的祖國是客觀存在，誰也否認不了，當然，對國家某些負面現象的監督、批評也應允許並歡迎。同時，對現代資本主義

包括港澳地區缺乏基本認知，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簡單化片面性思維。

應該肯定的一點是，現代資本主義至今尚未全面腐朽、更未全面沒落全面垂死。資本主義長期積累的資金、技術、管理、法制、信息等優勢繼續加以適度開發利用依然必要。建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絕不是美化、討好資本主義，而是要叫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實行社會主義單一制的國家對一、二個具特殊性的局部地區在恢復行使主權後允許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這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理念與制度創新。從管治層級來看，局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置於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之下，小資本主義對大社會主義是補充、配合，不是平起平坐；局部地區的首長作為下級要對中央政府負責，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定位是國家的地方行政區域，雙方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日益強大的國家主體社會主義可以對局部地區資本主義實行優惠政策，後者則可把依然佔相對優勢一面充分發揮並參與國家的深度改革開放事業，相互間純屬一個國家內部的資源整合與互利共贏，對於特區來講，應該是集中兩大制度的優勢的積極成果，絕不宜看成是兩個大制度消極因素的組合。

(四) 走好文明路

文明是一個民族自強復興的靈魂，文明需要長期有效積累。享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已有不俗的文明積累，當然，提升空間也有目共睹。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公民教育或國民教育絕對是事關政權穩定，是事關長治久安的大事。要確保“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正確推進，要有效面對並回應複雜而多變的形勢，要自始至終掌握住對形勢發展的主導權主動權，就要認認真真地從根本上、從基礎上繼續提升對“一國兩制”的歷史必然性、制度合理性和運作可行性的系統認知，亦即從理論上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判斷，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要繼續下功夫梳理、探索，擔任領導崗位的官員更應進一步作好適應、作好調整，要站在這個全面創新時代前沿，頂住歪風，作出積極判斷和正確選擇，要從事業的全局性、關聯的緊密性切入，建立大“一國兩制”思維，

把國家與特區、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擺好，把形勢發展要求和個人潛質開發協調好，把健康的價值觀、生涯觀、行為觀和對國家對民族光輝未來的信念進一步堅定起來，挺起胸膛，義無反顧地與文明結伴前行，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是時代面前的一項明智選擇。

九、結語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是行動上銳意進取的前提。”³²

經過長逾30年開拓探索、總結完善，“一國兩制”作為全新社會制度、全新發展模式、全新社會生態、全新力量博弈已經逐漸走向成熟。從特別行政區活生生為社會現實，從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企盼祝福中，從海外以及國際社會日益調整視角的關注中，人們深深感到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內涵的“一國兩制”不僅是十分完整、十分系統、十分合乎邏輯的新型理論，而且是大包容量、大涵蓋面、高創新價值的理論；不僅為新興特別行政區的開局、運行提供全面而系統的指引，而且為國家的深入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型定性和日趨完善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撐；不僅對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最後實現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順利完成帶來一股全新的動力來源，而且也為新世紀新時代國際事務的處理和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新型國際關係的建立帶來深刻啓示。

生活在這個嶄新制度下的特區人，我們更應保持一份清醒理性的頭腦，因為作為新生事物特別行政區在其發展道路上還要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已初見成效的經驗要堅持，有待進一步完善的事項要認真跟進，尚待探索並加以合理利用的空間要敢於面對。總之，在“一國兩制”新時代大事業面前，人人都有擴大參與的權利，人人都有成就理想的機遇，關鍵的一點是要嘗試把握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規律，要敢於在不確定性因素中捕捉具核心價值的積極因素，與時俱進，自強不息。

註釋：

- ¹ 轉引自《求是》雜誌，2012年第17期，第18頁。
- ² 許嘉璐：《做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準備》，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11月23日，第1版。
- ³ 見《辭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867頁。
- ⁴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頁。
- ⁵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
- ⁶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十九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29-204頁。
- ⁷ 胡錦濤：《中共十八大報告》，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2月9日，第2版。
- ⁸ 同註6，第29-205頁。
- ⁹ 同上註，第29-208頁。
- ¹⁰ 同上註。
- ¹¹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11月19日，第5版。
- ¹² 同註7。
- ¹³ 同上註。
- ¹⁴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0頁。
- ¹⁵ 同上註，第226頁。
- ¹⁶ 吳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憲政法律文獻匯編》(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239頁。
- ¹⁷ 同上註，第244-245頁。
- ¹⁸ 同上註。
- ¹⁹ 同上註。
- ²⁰ 喬曉陽：《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意義》，載於許崇德主編：《“一國兩制”知識叢書》序，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
- ²¹ 同上註。
- ²² 同上註。
- ²³ 楊允中：《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7期，2011年，第19頁。
- ²⁴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十二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2-318頁。
- ²⁵ 同上註，第12-331頁。
- ²⁶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十八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28-153頁。
- ²⁷ 同註3，第2903頁。
- ²⁸ 同上註，第2537頁。
- ²⁹ 同上註，第1549頁。
- ³⁰ 同註5。
- ³¹ 同上註，第2頁。
- ³² 胡錦濤：《在紀念中共成立9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7月30日，第2版。